

因此,跨文化的综合研究显然应当成为比较艺术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

术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

比较艺术学: 现状与课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李心峰

关于比较艺术学研究,我想说两句话。一句是:比较艺术学存在着,发展着;另一句是:比较艺术学还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课题。

1. 比较艺术学存在着,发展着

在我国,零散的、不自觉的艺术比较研究,可以说古已有之,而作为一种自觉的方法或学科的比较艺术学或叫比较艺术研究,则是80年代末,随着西方各种美学、艺术学、文艺学研究的新方法、新学科、新领域纷纷被介绍到国内,而被引进我国学术领域的。本人于1989年发表了论文《比较艺术学的功能与视界》、《比较艺术学:艺术世界系统联系之“桥”》,对国外比较艺术学研究的成果作了介绍,也谈了自己对这门学科的方法、对象、功能、视界等问题的初步看法;《世界艺术与美学》丛刊则在第十一辑将国外比较艺术研究方面的成果作为重点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与此同时,国外一些有关艺术与宗教、艺术与科学、艺术与哲学等领域的比较艺术研究著作也被翻译介绍了过来。笔者于1991年选编一本介绍国外当代艺术学新兴学科、新兴领域的译文集《国外现代艺术学新视界》时,也曾把比较艺术学作为该书重点介绍的新兴艺术学科之一。

在翻译介绍国外比较艺术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国内一些学者已开始自觉地运用比较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在一些具体的艺术门类和艺术研究领域展开扎扎实实的比较研究和

学科建设工作,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发表、出版了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研究专著。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有限的范围而言,仅在比较戏剧学方面,1992、1993两年之内,便出版了田本相主编《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安葵《戏曲“拉奥孔”》、周宁《比较戏剧学——中西戏剧话语模式研究》、蓝凡《中西戏剧比较论稿》等数种研究专著;而在其他艺术门类,也出版了邓乔彬《有声画与无声诗》及田本相《电视文化学》(该书不完全是一部比较电视学的著作,但将电视艺术与电影、戏剧、文学、电视与传媒、教育、政治加以自觉而系统的比较的内容在全书中占有相当的篇幅)等著作。此外,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与美国俄亥俄大学比较艺术系的学者共同完成的一部比较艺术研究论文集,其英文版已经出版,其中文版也即将出版。几年前,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还成立了国内第一个专门以比较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比较艺术研究中心”;该中心又于1997年底与文化艺术出版社联合召开了国内第一次“比较艺术研讨会”,标志着比较艺术学自介绍到国内以来,经过十年左右的探索和实践,已形成一个整体的力量推向社会,得到艺术研究界普遍的认可与欢迎。总而言之,比较艺术学研究,即使是在国内,也不是一片空白,无需一切从零开始,而是已经存在着,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

2. 比较艺术学面临的课题

尽管我们说比较艺术学研究在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然而,我们对此决不能过于乐观。应该说,对于一门学科的确立和发展而言,这些成果的取得还只是初步的;在它的面前,还存在着许许多多有待思考和探讨的问题,需要广大的艺术研究工作者们共同的探索和实践,以使比较艺术学这门新兴的艺术学科真正在今日艺术学的学科体系中确立自己应有的地位,把这门学科的探讨进一步向前推进。

在比较艺术学研究所面临的各种课题中,我以为有这样几方面的课题相对地说是较为重要的。

首先,需要对比较艺术学既有的研究成果、思想资料进行摸底、梳理、阐释、探讨。这是比较艺术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确立起来的基础建设工程。缺少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环节,比较艺术学研究就有可能成为无本之木、空中楼阁。这对比较艺术学的未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这里所说的比较艺术学的研究成果和思想资料,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古典艺术论中有关艺术比较的思想资料。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丰富,但至今仍没有人做过深入的挖掘,更谈不上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二是西方古代、近代艺术理论中有关艺术比较的思想资料。这方面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尤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达·芬奇、莱辛、歌德、黑格尔、尼采等在这方面的贡献更为突出,影响深远。我们对这些内容也许并不陌生,但尚需从比较艺术的角度给以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三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中期西方分别明确提出“比较美学”(Comparative aesthetics)和“比较艺术学”(Vergleichende Kunstwissenschaft)的学科名称以来在艺术比较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值得我们重点介绍和探讨,特别是在这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一些名著,如雷蒙多(G. L. Ray-

mond)的《在绘画、雕刻、建筑中的线条、色彩的比例与和谐——比较美学试论》(纽约,1899)、E. 苏里奥(E. Souriau)《各种艺术的对应关系——比较美学原论》(巴黎,1947)、门罗(Th. Munro)的《各种艺术及其相互关系——比较美学》(纽约,1951)、弗莱(D. Frey)的《比较艺术学基础》(维也纳,1949)(吉冈健二郎的日译本译为《比较艺术学》,创文社,1961)、沃尔泽(O. Wazzel)的《各种艺术的相互阐发》(柏林,1917)等著作,以及日本当代著名美学家山本正男主编、由世界多国学者合作完成的六卷本《比较艺术学研究》(东京,美术出版社,1974—1981)等成果,都应设法尽快翻译或介绍过来,作为我国进行比较艺术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参照。四是现、当代我国一些著名学者的著述中包含的有关艺术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资料,如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中就含有大量珍贵的比较艺术的研究成果和思想资料;此外,在宗白华、朱光潜、王朝闻、伍蠡甫等人的美学、艺术理论著作中,也含有这方面的丰富成果和思想资料,这都需要我们给以梳理和总结。

其次,要对比较艺术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如比较艺术学在艺术学研究中主要是作为一种学科还是作为一种方法论或是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一种研究视界在起作用?进行比较艺术学研究是为了实现怎样的学术目的?是为了认识一般,还是为了认识特殊,抑或是为了别的目的?它与其他相关学科如比较文化学、比较哲学、比较美学、比较文学以及艺术学内部其它学科如艺术类型学、民族艺术学、艺术文化学、艺术史、艺术批评等的关系如何?等等。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关系到比较艺术学在学理上存在的依据、它在方法论和学科地位上的定位等重要问题,有必要给予应有的探讨。否则,连对比较艺术学是否有必要存在、应该怎样存在和发

展等基本问题都不甚了了,怎么能有效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呢?

再次,比较艺术学研究必须真正打开视野,真正起到艺术世界内部各分支系统之间以及艺术与外部世界之间相互沟通的中介桥梁的作用。在我看来,比较艺术学主要有三大研究方向。一是艺术类型间的比较,包括艺术种类与艺术风格的比较;二是不同民族、地域、文化圈艺术的比较;三是艺术与其他文化创造领域的比较。今天,比较艺术学研究要想获得全面的展开,那么,它在艺术类型间的比较方面,就不能仅限于艺术门类之间的比较,而应扩大到对艺术世界各种基本风格、思潮、流派之间的比较;在不同民族、地域、文化背景下的艺术的比较方面,就不能仅限于中西艺术的比较或东方与西方艺术的比较,而应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到世界上其他的民

族、地域和文化圈;在艺术与人类其他文化创造领域的比较中,也不应仅限于艺术与科学、宗教、伦理这几个领域的比较研究,而应把比较的范围尽可能扩大到人类文化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领域,诸如艺术与技术、与政治、与神话、与巫术、与仪式、与医学、与体育、与娱乐等领域的比较。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在艺术种类间的比较、中西艺术或东西方艺术的比较以及艺术与科学、宗教、伦理的比较这些方面已经多么深入、多么成熟。实际上,我们在这些领域所做的比较研究恐怕大多也只是初步的、表面的,需要进一步展开更加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不过,相比较而言,这些课题较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一般不会成为人们的盲点,而另外那些领域则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因而需要在这里提出来,希望它们也同样能够得到人们的关注与探讨。

崛起的比较艺术学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杨乃乔

倘若我们用一种跨文化的视野来反思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东西方学术界,从1886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H. M. Posnett)率先起用“比较文学”来命名自己的著作,到1986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东西方学者在一百年的思考中已着实地把跨文化的比较视野投注世界文学研究的领域中,并且成功地比较文学拓建为20世纪人文学科中的一门显学。在20世纪的80、90年代,随着西方后现代社会高科技工业文明对东方大陆的影响,信息的高速传递加快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在东西方文化越来越频繁与广泛的

对话中,比较的视野终于超越了文学,激发了东西方学者在更为开阔的感性和审美层面上互为看视的兴趣,可以说,这就是比较艺术(comparative art)在东西方学术界崛起的世界文化背景。回眸比较文学在东西方学术界的发展,比较文学研究在一种良好的态势下正在深入地走向文化化与理论化,这必然导致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思考向比较文化(comparative culture)与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这两个方向拓展。如果说,比较文化在视野上昭示了比较文学拓展的广度,比较诗学在理论上呈现了比较文学拓展的深度;那